



茅盾與《小說月報》、《文學》月刊 衡人論藝之一

陳徵毅 ◎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退休副教授

✿ 《小說月報》是名作家成名的階梯

清末民初由於梁啟超倡導小說界革命，使專門刊載小說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蔚為大觀，諸如《新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月報》、《綉像小說》等，其中以《小說月報》壽命最長。

《小說月報》的創辦人肯定文學和文學工作者服務人生的重要性，認為中國現代文學一直要接受西洋現代文學的精神與作風後才有可能成熟，因此對十九、二十世紀西洋文學的介紹與翻譯，一直占據《小說月報》極大的篇幅，從屠格涅夫與托爾斯泰到德利葉夫和阿茲巴雪夫之間的俄國小說家受到最大的重視，波、匈、捷及歐洲弱小國家也很受注意，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和這些國家同屬受壓迫民族，他們的奮鬥經驗必使中國獲益無窮。

早期《小說月報》只有數十個固定投稿人，到了 1928 年網羅當時最有名的小說家茅盾、老舍、冰心、巴金、許地山等人，這些作家都在《小說月報》上刊登他們的作品才得成名，《小說月報》成為名作家成名的階梯。

比如茅盾的長篇小說〈子夜〉，發表於 1932 年，算是中國現代新文學的主要作品，書中主角吳荪甫是中國三〇年代民族資本家的典型，他雄心勃勃兼併八個小廠，創立信託公司企圖掌控經濟市場，後來卻與公債市場上呼風喚雨的趙伯韜競爭而失敗了，甚至意圖自殺。要而言之，〈子夜〉雖然有點冗長沉悶，但是很具氣勢，不愧為自然主義中的力作。茅盾在《小說月報》發表幾篇文學評論文章，討論中國文學界的當前狀況，其中論調鞭辟入裡可惜稍嫌侷限於自然主義的觀點而已。為何同期小說家都比不上他，因為他是先在寫作技巧和生活體驗方面痛下功夫，才致力於長篇小說的寫作。

冰心的成名作〈超人〉，刊登於第 12 卷第 4 期，被周作人列為範文在課堂上賞析，主編對她說：讀了你的〈超人〉沒有不哭的。

老舍於 1925 年赴倫敦大學教中文，對狄更斯作品極為喜愛，模倣他寫了一篇〈老張哲學〉，時在英國念書的許地山很喜歡此篇，便推荐给編輯，自 1926 年 6 月開始連載，後又寫一篇滑稽小說〈趙子曰〉，前者是一個邪惡教員與雜貨商人的故事，對公理淪喪後的英雄主義處理得不錯，後者主人公趙子曰慷慨天真亂花錢，是思想腐敗之化身，儘管自己有溫良品質，切盼

取得民初北京腐敗官場中沽名釣譽的妝點，醇酒美人和高官，但最主要的是有個官銜，趙並無雄心和貪心，因無官職不能擺紳士的闊綽派頭而感屈辱，一種不確切的驕傲心理，使其以為鄉太太的小腳會丟他臉，因而從不見她的面，另一方面他認為紳士應有才貌雙全的太太而追求大學女生王小姐結果也是徒然。唯一來自臺南的許地山，在第 12 卷第 1 期登過〈命命鳥〉，並於第 12 卷第 4 期登過〈商人婦〉，前者描寫女主角因婚姻受阻，無法與人共結連理，竟然想不開而投湖自殺。許地山旨在揭露封建社會婚姻制度的殘酷，他宣揚生命可貴凡事三思而後行的思想。後者透過惜官口述，採用倒敘法表達商人婦的遇人不淑受苦受難的始末。

巴金的第一篇小說〈滅亡〉經由葉聖陶代為發表。1927 年巴金由上海赴巴黎，正逢兩個意大利人薩柯（N. Sacco）與樊塞蒂（B. Vanzetti）被人誣為竊盜殺人犯，在美國麻省波士頓牢中關了六年，巴金寫信給樊表達慰問之忱，樊對他說：「青年是人類的希望，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他非常感動，認為說出心中話，孰料九個月後，薩樊二人被處死於電椅上，使巴金悲痛莫名，當他接獲薩樊二人噩耗時，整天激動地寄信給各處控訴美國政府，他內心的同情促使他寫成〈滅亡〉廿一章。他在小說中吶喊：「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該滅亡」，他刻意抄寫在五大本硬紙面練習簿上，由法國小城阿多吉里寄回中國，由葉聖陶在《小說月報》分為四期刊登，巴金從此決意以寫作做為救世救人之路。

❁ 茅盾主編二年，聲名大噪

曾任中共首任文化部長的茅盾，是位小說家、編輯人和社會運動家。茅盾本名沈德鴻，字雁冰，浙江桐鄉縣人，生於 1896 年，卒於 1981 年，享壽八十有六。他的小說處女作〈幻滅〉在《小說月報》發表時，主編葉聖陶建議使用茅盾為筆名。他 10 歲喪父，14 歲考上湖州的浙江三中，17 歲考上北大，三年後預科畢業，卻因家庭經濟困窘無法繼續升學，就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供職。初入館得前輩資深編輯孫毓修、朱元善和王蕓農的指引，由於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很快就超越他們，入館就上書指陳商務印書館新出的《辭源》的訛誤疏漏之處，使總經理張元濟發現他的博學多才和治學銳氣，遂調他到大名鼎鼎的孫毓修處當助手合作譯書，起初孫不把乳臭未乾的他看在眼裡，把他譯了三四章就懶得再譯的科普讀物卡本特《人如何得衣》，讓他試譯，不料不到五個半月茅盾即交稿，譯文仿孫意譯之方法和駢體色濃的語言風格，使孫嘆曰：「驟看彷彿出自一人的手筆。」茅盾在署名時說：「只用你一人的名字就好。」這種高姿態的人格力量，震撼得孫又驚又喜不再輕視他。

其後寫《人如何得食、得住》，孫見其書讀得很多，便探問他，答曰：「我從中學到北大，書不讀秦漢以下，文章以駢體為正宗，涉獵十三經、四史、後漢書等，入商務將廣收中外典籍的涵芬樓圖書盡覽無遺。」

1918 年由孫毓修籌畫選編中國寓言之初續三編，1917 年底《學生雜誌》主編朱元善，邀茅



盾任助編。1919年《小說月報》主編王純農也邀其主編該刊約佔三分之一篇幅的「小說新潮」專欄，同時為其主編的《婦女雜誌》撰文。

茅盾主持「小說新潮」專欄只是全面改革《小說月報》的前奏，等到茅盾取代王純農正式出任主編，才是《小說月報》改革的開端，從此，《小說月報》成為中國文壇一塊權威的引導新潮的陣地。

他主持「小說新潮」採取三大原則：1. 只要以真為核心，真善美統一的，不論新舊均予借鑑；2. 譯介盡量廣泛，系統化，世界各國文學民族、時代之代表性作品均可。3. 按對位需要，取先進的西洋文學特質與中國舊文學可取的特質；4. 承接表現人生宣傳新思想，辟邪去偽的真任務，此種取向與五四的時代精神相同。

1921年1月10日，推出《小說月報》「被迫害民族文學專號」，介紹五個人種：斯拉夫、新猶太、希臘、阿美尼亞、芬蘭等民族的文學，除新猶太概觀為他所寫，其他七篇皆為外國學者所執筆。譯叢共收小說、散文、話劇十一篇，詩十首，作品和論文的譯者為魯迅、周作人、沈澤民，茅盾所譯最多，可謂一箭雙鷗之舉，一面譯述被迫害民族的文學與相關的理論，又可展現中國最高的翻譯水準。

1921年1月，主持《小說月報》，重倡自然主義與實地觀察客觀描寫的原則，主動出擊，誓奪舊文學的代表鴛鴦蝴蝶派的陣地。《小說月報》原本受梁啟超發起小說界革命的影響，於1910年創刊，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的名牌期刊，後隨社風的頹敗，漸成鴛鴦蝴蝶派的陣地。1917年，陳獨秀、胡適發起以文學革命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新思想展現新動向，艷情、畸情為特徵的鴛鴦蝴蝶派已不受青年喜愛。

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於1919年4月在《新潮》發表〈今日中國之雜誌〉，對當時幾百種雜誌進行批判，其中有一大段批判商務印書館的刊物說：「他們大都毫無主張，毫無選擇，只要是稿子就登，這種辦刊物方法，真可以說對社會不會發生一點影響，也不能改善一點灌輸新知識的責任。」受到新派人物的批評，發行量為之銳減，最後只剩下二千本，使商務的決策者不得不進行改革，必須選拔主持改革的負責人，茅盾的學識素為社會和館方所共知，無論學養或文學水平還是新文化的觀念，他是最佳人選。

於是由編譯所長高夢旦代館方找他談，請他出任《小說月報》和《婦女雜誌》的主編，他推卻《婦女雜誌》只擔任《小說月報》的主編，以便集中全力搞好文學改革和新文學建設之大事。

接任伊始，他向館方提出三項要求：1. 現存稿件全部封存不用。2. 刊物改用五號字印刷，（原為四號字）；3. 館方應給予辦事全權，不得干涉他的編輯，另外，只有封存舊稿才能於百日內為新文學多覓一陣地，改用五號字才能擴大刊物容量，只有辦事全權才能完全自在地按文學改革和新文學建設及要求設計刊物之內容版本進行組稿和編輯操作，此乃自主意識的辦報原則。

《小說月報》前主編王純農就是自主意識被動之代表，茅盾一上任即表現自主意識，他徹

底改革此塊文學舊陣地，使之建設為新文學搖籃，他對《小說月報》也提出新改革：宗旨是建設中國的新文學，爭取在世界文學界佔一席之地，為人類文化做出貢獻，欄目之設計，編輯之方針，均應服從這個總目標。翻譯、評論、創作三角鼎立。譯述西洋名著介紹世界文學潮流趨向，討論中國文學改革進步之方法，創造一個確能反映國民性，提倡文學上的批評主義，使其與創作者相互激勵，相互攻錯而止於至善。另外，還要報導海外文壇消息，評論新書新報，使作家和讀者了解國內外文壇動態。對新刊物的這些設計，幾乎囊括了所有重大問題。

《時事月刊》副刊「學燈」發表李石岑之文，《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也發表評論，都對《小說月報》的改革表示歡迎，並給予極高評價，曉風云：「改革後的第一期已伐毛洗髓容光煥發，換了個靈魂」。改革後的《小說月報》也帶來利潤，第一期印五千本，改革後多三千本，還供不應求，第二期起增為七千本，年底突破一萬本，發行量增加，反映改革之成功，但成功後招致舊派人士的反對，外部阻力也不小，第一期按例送商務領導階層總管理處權勢人物陳淑通，他不屑一顧，連信封都不拆，原樣退還茅盾，惡劣之謾罵，做人身攻擊，茅盾冷靜應付。準備在第13卷第7期爭辯和批駁。而發表〈自然主義與文學〉一文闡發一己之創作主張，批判鴛鴦蝴蝶派文學的惡趣味，記帳式的表現法，引用鴛鴦派作品作為批判的靶子，更激起激烈的反對，除了對茅盾人身攻擊外，並對商務當局施加壓力。

❁ 茅盾以辭職向守舊派抗議

要求茅盾對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刊物道歉，否則提告，支持茅盾改革的頂頭上司高夢旦辭職，換上保守派上司王雲五，王派人勸說茅盾，茅斷然予以拒絕，並義正詞嚴指出，禮拜六派先咒罵《小說月報》和我個人足足半年之久，我才以文藝思想的角度批評禮拜六派，如要打官司，商務應先控禮拜六派，況且文藝思想問題，北洋軍閥都不敢做的事，要求傳話人轉告王雲五，他要把此事包括商務的態度，原原本本用公開信的方式，登在《新青年》及北京、上海四大報副刊，喚起全國的輿論，看禮拜六派還敢不敢打官司，王怕把事態鬧大，只好息事寧人，又偷偷派人檢查《小說月報》發排的稿子，茅盾發現後立即向王提出抗議，以原條約為據，據理力爭，表現勇於硬碰硬的堅強品格，王只好取消。

茅盾編完第13卷將編務交給鄭振鐸，以辭職向守舊派表示抗議，維護編輯自主意識的尊嚴和神聖。茅盾不但辦出期刊的特色，也做出自主意識的具體表現。1933年《小說月報》宣布停刊。

茅盾雖然僅僅主編二年廿四期，但他卻能發揮現代編輯理念，改革創新精神，建設新文學，為他日後的後繼者鄭振鐸、葉聖陶保持了《小說月報》的一致性，同時他在後來的編輯生涯中，一直保持這些正確的概念和作風與時俱進。根據時代的變革要求和文壇面臨的新形勢，不斷調整，充實和提昇。

1933年，《小說月報》停刊，茅盾和鄭振鐸商量創辦另一大型文學月刊——《文學》，由茅



盾主編，此時新文學建設已屆十多年。創作成果不斷湧現扎根開發。

當時茅盾把更多精力用於對付出版的險惡環境，國民黨正在進行文化圍剿，尋求進步革新的報章雜誌常被查封，作家創作不自由，茅盾也列在國民黨通緝名單內，他必須和國民黨鬥智鬥勇。

茅盾在辦刊宗旨欄內寫明要辦一純文學刊物，他廣邀魯迅、葉聖陶、郁達夫、傅東華、鄭振鐸、茅盾等十人組成編委會，主編由傅東華掛名，因為乃兄為江蘇省教育廳長，較能罩得住。

編輯者署名文學社，出版社由生活書店承擔。因生活書店有黃炎培的中華職業教育社的背景，刊物出刊第一卷，國民黨就要進行書報檢查，要查編者署名，檢查每期稿件，茅盾與鄭振鐸自第2卷第1期起改用傅東華、鄭振鐸掛大名，每期付排交稿由傅東華送交國民黨當局，第2卷1期被查後抽掉之文有巴金的〈雪〉，歐陽山〈我們歇歇也好〉，和夏征龍的〈恐慌〉，第二期送稿十篇又被抽掉一半，其中有鄭伯韜、張天翼的文章，此舉帶來大麻煩，臨時補寫，修訂審查大員亂刪亂改之處，加重編者負擔。茅盾和鄭振鐸商量自第三期連出四個專號，翻譯專號／創作／弱小民族文學專號／中國文學專號，如此可避開檢察官的眼線。

四大專號集中全國著名專家學者的文稿，質量並重影響力大，由此茅盾摸清了檢查官的脾氣，從三卷起不斷更改作者的筆名，出特大號雖仍有被刪節抽調之文，但茅盾已有更豐富有效的應付經驗。

《文學》月刊自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上海淪陷時始告停刊，前後維持四年以上，共出五十二期。是繼《小說月報》之後，三〇年代壽命最長影響力最大的文學期刊。對新文學建設有著承先啓後的作用，其中凝聚著茅盾的大把心血和汗水。

茅盾主編《小說月報》，茅只是一人唱獨角戲，他當時的工作量是常人難以想像的，有人統計他每月讀外稿約四十萬字，跟蹤閱讀期刊約六十萬字，再加上個人翻譯寫作，需要閱讀的外國文字和論著，一絲不苟負責雜誌的付排校對，沒有遠大的理想抱負，沒有任勞任怨的工作精神，沒有園丁的犧牲奉獻，牢固的群眾觀點，他是支持不下去的。

關懷老作家，培育新作家是他一生志業的重點，付出的心血無法估計，他扶持的新文學作家共計三一三人，其中成名的約有一百人，大都成了文學大廈中的柱石，可謂手澆桃李千行綠，點綴春光滿上林了。

❁ 與秦德君搞出婚外情

最妙的是1928年，他為躲避國民黨的追捕避居東京遇上秦德君，發生一段婚外情，一個是消極悲觀客居異鄉，一個是亡命天涯一見鍾情，共聚一年對撫慰其心靈及文學創作大有裨益，只是對老家的元配孔德沚只好說聲抱歉了！

在改革《小說月報》之初，他確立了文學上的評點方式，在批評方法上他對《小說月報》

的新人新作創作制訂評點式的三言五言畫龍點睛地指出作品的主要特點，旨在溝通作者和讀者的思想情感指導讀者閱讀，提高讀者的思想情感，指導讀者閱讀提高讀者的欣賞水準。

如批評冰心小說〈超人〉，突出肯定其以情感人的特長；在落花生換巢鸞鳳中說，它的最大特點是真，並與魯迅在《新青年》發表的短篇相提並論地說魯迅小說確是真氣撲鼻，就不單只作品的特點，指導讀者閱讀而且對文學創作也有普遍指導的意義了。

旅美評論家夏志清曾對茅盾的代表作〈子夜〉提出批評，他爲了透徹表達三〇年代的中國面貌，曾上窮碧落下黃泉去找資料務使其無懈可擊，書中爲做詳盡報導，軍政界名人提到不少，但反使人感到厭煩。在此書中茅盾的同情心範圍縮小，代之以自然主義的漫畫手法和誇張描述。女主角大都失了水準，淪爲漫畫家筆下的人物，茅盾的小說家感性，已經惡俗化了。堪稱的評。


❁ 結語

茅盾在離開《小說月報》後，轉任《文學》雜誌主編，特闢書報述評專欄，他寫的長篇小說〈子夜〉，就在這雜誌連載，並出版《茅盾散文集》。

抗戰軍興後，他投身抗日愛國運動，參加《吶喊》編務，上海被佔領之後，他開始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先到廣州主編《文藝陣地》雜誌，又到香港《立報》主編「言林」副刊，定居香港及大後方，寫了許多有關小資產階級的小說，被稱爲「抗戰期間首席小說家」。曾聯名三十三位作家向政府要求保障言論自由，展現文人的心願。

1941年他主編《筆談》月刊，日軍攻佔香港，只好逃到廣西桂林，他把逃離香港的始末寫成《劫後拾遺》一書交由桂林學藝出版社出版。抗戰末期，他先往迪化新疆學院任教，再往陝西延安魯迅藝院講學。

中共建政後，他出任首任文化部長，爲期十五年，旋即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及全國作家協會主席。儼然成了望重一方的要員，曾赴維也納出席世界人民和平會議，也曾出席亞洲作家會議。

乃妻孔德沚在文革期間受到紅衛兵抄家，憂愁過度而去世，令他哀傷逾恆。他於1981年3月27日，因整理舊作過度勞累而病逝北京醫院。享年八十六歲。他的小說《春蠶》、《林家鋪子》描寫舊社會破產的農村，及廣闊社會背景裡的掙扎行動，曾被拍成電影，影響至深且廣。

參考書目

1. 陳徵毅（2009）。一書一世界，千里問新知。臺北市：文史哲。
2. 丁爾綱，李庶長（2004）。茅盾人格。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
3. 吳泰昌（2003）。我親歷的巴金往事。上海市：文匯出版社。